

◆刘占锋 著

虚实

新华出版社

序

杜飞进

《无题集》、《虚实录》是刘占锋同志即将出版的两部文集。面对这两部沉甸甸的书稿清样，作为占锋同志的多年朋友，我在由衷地为他感到高兴的同时，也不禁想就这两部书稿谈点自己的感受。这样，既可作为对占锋同志希望我为这两部集子写几句的“交待”，又可与这两部集子的读者交流自己的看法。

占锋同志长期在地方党委从事宣传工作，后来又服从组织的安排到地方新华书店从事图书发行工作。他在工作之余勤于笔耕，发表了大量的调查报告、言论和研究性文章等，五年前就出版了一部名叫《务本求真》的文集，这次结集出版的两部文集所收入的文章，绝大多数是他在最近这五年里发表的。而且据我所知，收入其前后三部文集的文章也仅仅是他发表于各类报刊上的文章中的一部分。作为长期工作在基层第一线的同志，无论从事地方党委宣传工作的组织和管理，还是从事新华书店图书发行的领导工作，其繁杂和紧张是可想而知的。占锋同志能在如此紧张的日常工作之余长期笔耕不止，十几年如一日，其精神

实属可嘉。

“干一行爱一行，干一行钻一行”，这是多少年来人们既用来要求自己又鼓励他人的一种工作态度，一种工作精神。然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其中既要能“爱”得起来又要能“钻”得进去。“爱”得起来，既意味着对人生的一种态度，又意味着对事业的一份责任；“钻”得进去，既意味着对知识的一种态度，又意味着对工作的一种精神。这种态度，这种精神，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人们干好工作、成就事业，完善自我、实现价值的根本。在翻阅了收入这两部集子的文章篇目后，我发现其中的大量文章与作者所从事的工作密切相关，它们体现了作者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所始终保持着的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这就是对自己的工作既“爱”得起来又“钻”得进去的态度和精神。比如，《关于战役型报道》、《关于进一步打击非法出版活动的思考》、《建立健康繁荣有序的音像市场》、《关于盗版问题的思考》等，就是作者在从事地方党委宣传工作的组织和管理、从事“扫黄打非”工作期间写下的有关研究性文章；《消化系统——中国书业发展的瓶颈》、《关于组建出版发行集团的几点思考》、《在两个效益的交叉点上做文章》、《构筑现代书业营销与传媒网络》、《试论新华书店的改革与发展》、《加入“世贸”以后，中国书业面临的形势与对策》等文章，就是作者在出任地方新华书店总经理从事图书发行工作以后，通过对我国新华书店系统的运行机制和图书发行市场的现状及其存在问题的深入调查和分析而写下的。这些文章，或者是作者在推进工作中对遇到的有关问题的调查与思考，或者是对某个领域普遍性问题的调研

与分析，或者是对某项工作的理性总结，其中无不倾注着作者对自己所从事工作的“爱”的深情，无不凝结着作者对自己所从事工作的“钻”的心血。

文章贵在言之有物。所谓言之有物，顾名思义就是文章有内容、有观点、有材料，而不是空洞无物、泛泛而论。要做到这一点，看起来容易，其实并不简单。如果人们把自己读过的书刊做一回顾，其中真正能称之为言之有物的恐怕并不容易。这是因为，言之有物所要求的有内容、有观点、有材料，并不是唾手可得的，它需要人们深入实践、深入生活，了解真实情况，占有大量材料，并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深入分析和独立思考，从而提出自己的独到的见解，既不人云亦云，又不为纷繁复杂的表明现象所迷惑。也就是说，要做到言之有物，就必须重视调查研究，善于调查研究。在翻阅了收入这两部集子的文章篇目后，我发现这些文章的最大特点就是，它们都是作者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经过独立思考之后写出来的，真正做到了言之有物。由此联想到我与占锋同志的多年交往，他给我的最深印象之一不就是重视调查研究，善于调查研究，力求做到务本求真么！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敢说这两部集子折射出了作者务本求真的可贵作风，是文如其人的恰好注解。

文章合为时而著。这既是古训，又是历代文人富于历史使命感的一种集中概括。“为时而著”的“时”，即时代之意也。“为时而著”，对于读书人而言，它意味着自己对时代的一种关注，对现实社会的一种关切，对改造社会、促进社会进步的一种责任和使命。古往今来，做到“为时而著”的虽不乏其人，但可以肯定地说，更多的是虽有

“为时而著”之心，却未必有真正的“为时而著”之“文”。究其原因，就在于要想真正做到“为时而著”，就必须倾听时代的足音，呼吸时代的空气，把握时代的脉搏，让自己的心合着时代的节奏一起跳动，真正用心去感悟时代、体验时代，为时代而歌、为时代而唱。而要做到这一点，光靠有“为时而著”之心是远远不够的。值得欣喜的是，作为朋友我不仅深切地感受到了占锋同志胸中怀有的那颗强烈的“为时而著”之心，而且还读这两部集子的字里行间真正读到了占锋同志那些深刻的“为时而著”之文。人们知道，我们当今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以信息技术和生命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方兴未艾、知识经济初见端倪，是我们这个伟大变革时代的基本标志。可以说，正是这些时代的基本标志，构成了占锋同志多年来关注时代、把握时代的基本找点，构成了他为时代而歌、为时代而唱的基本音符。关于这一点，我想读者朋友从占锋同志的这两部集子所收入的文章中就可以得出与我上面相同的结论。

以上几点是我在读完占锋同志这两部集子的文稿以后所想到的。在这两部集子即将出版之际，我把它们写出来，聊以为序。

2000年10月22日

于北京涵虚斋

目 录

序.....	杜飞进 (1)
--------	---------

关于文化

关于散文的第三次飞跃	(3)
关于历史文化名城发展旅游业的思考	(16)
“学而优则仕”与市场经济	(31)
观念现代化——民族振兴的钥匙	(37)
民族振兴首先要张扬民族之气	(44)
收藏，一个新的投资热点	(50)

关于“打非”

关于进一步打击非法出版活动的思考	(59)
建立健康繁荣有序的音像市场	(66)
关于盗版问题的思考	(83)

关于新闻

- 浅谈穆青的人民意识 (97)
- 关于构筑现代新闻网络的思考 (122)
- 关于战役型报道 (129)

关于书业

- 要害是实现先进生产方式的跨越 (157)
- 消化系统——中国书业发展的瓶颈 (178)
- 关于组建出版发行集团的几点思考 (189)
- 在两个效益的交叉点上做文章 (195)
- 着眼于优化经营结构与文化建设的有机结合 (212)
- 构筑现代书业营销与传媒网络 (224)
- 试论新华书店的改革与发展 (236)
- 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书业面临的形势与对策 (255)

关于文化

关于散文的第三次飞跃

我对散文可谓情有独钟。虽不善写，但爱读。从读中感悟人生，品评哲理，陶冶情操，既是一种美的享受，又可从中窥听历史或蹒跚或铿锵的脚步。可以说，读散文是我一项重要的业余生活。然而，一个时期以来，我渐渐觉得散文离我们愈来愈远了。在火热的变革时代，像电视、小说都使出了浑身解数，把那些渴望通过艺术的手段或解疑释惑，或寻找向导，或汲取力量的人们紧紧拢在了自己的身旁，而散文却显得有几分冷漠，与火热的时代极不协调。难道在历史上曾经指点江山、叱咤风云的文体，到现在真的成了走不出文人孤芳自赏小圈子、只配为花草闲情做嫁衣裳的小品了么？于是，一些关于散文与时代与政治的关系，以及新时代散文发展趋势等想法也就一直萦绕在心头，不吐不快。

• 载于《郑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

大凡做学问者，都知道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的名言。这句话原本就是针对散文而说的，其实它也反映了整个文化产生、发展的规律。作为最早以文字形态产生的社会文化之一，散文从它诞生那一天起，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它所赖以产生和发展的时代的滋润和推动；或者说，它本身就是应着时代的斗争需要而产生、和着时代的脉搏而跳动的。散文发展史证明，正是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特别是处于历史转折时期的政治斗争，为散文提供了深邃的思想、丰厚的素材和强烈的时代需求，而较高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和开明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又是它不可缺少的发展基础。正是这些，使散文形成了两次革命性飞跃。现在，历史也将无可辩驳地再次证明，改革开放的年代和开明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将为散文带来第三次飞跃。

散文的第一次飞跃是在战国时期。其标志就是散文开始由基本上全是对君王的文告和君臣的谈话记录，发展为叙事的历史散文和说理的诸子散文。我国古代第一部记叙文和论说文的集子《尚书》可以说是我国散文的开端。当时各方面都十分低下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使其只能是一些誓词、政府的文告、贵族的告诫之词以及一些记述文字等，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和政治内核。到了战国时代，新兴的封建制度代替了腐朽的奴隶制度，社会生产力蓬勃发展，与之相适应的哲学、法学、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都有突飞猛进之势，从而促进了社会分工的进一步细化，已经产生了可以有一部分人专门从事精神文化生产的社会条件。特别是诸侯割据、兼并的加剧，使各国统治者纷纷罗致人才，“养士”之风盛行。“士”游各国，可“朝为布衣，夕为卿相”，于是，“士”的阶层迅速崛起，形成了我

国历史上一个十分令人注目的现象。这正是那个时期之所以形成百家争鸣局面的社会基础。也正是这个社会条件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封建社会文化的发展，形成了以散文和诗歌为主要内容的划时代的文化繁荣。历史散文出现了《左传》、《战国策》那样的巨著；诸子散文也产生了《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具有很高或较高文学价值的杰出著作。对于这个时期百家争鸣和文化繁荣的形成，孟轲“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一句话，就很确切地说出了当时著作家的心情。面对这样的时代，散文是不可能保持沉默的。正是散文的积极参与，它才在社会上提高了自己的地位，并获得了迅速的发展。

散文的第二次飞跃是在唐代中叶。其标志是文学性散文从历史和哲学著作中分离并独立出来，使其真正成了文学活动中强劲的一支。然而这个分离，既是我国文章发展的必然结果，更是当时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唐代，由于统治阶级采取了一系列较为开明的政策措施，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迅速发展，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罕见的连续一百多年的封建经济繁荣时期，并于开元年间达到了顶点。然而，唐王朝也并非一帆风顺，也是社会危机深刻发展的时代。开元盛世就是安史之乱以后由中衰向中兴转变的时代。这时，一些开明的士大夫为了唐王朝的统一，维护封建秩序，抵御侵扰，便积极崇尚儒学，以恢复儒家的正宗地位。这在广大庶族阶层得到特别强烈的反响。这样，崇尚儒学的社会阶级基础已经形成，那些讲究排偶、辞藻、音律和典故的骈文就理所当然地成了表达思想、反映现实的镣铐，文体改革大势使然。没有这个条件，韩愈所倡导的儒学复古运动也就成了无源之水，不可能带来古文运动

的蓬勃发展，文学性散文与“大散文”的分离也就无从谈起，甚至连韩愈那些刚健雄肆、奥衍闲深的雄文也难以问世。所以，他特别强调“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认为文学的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关系应“文”“道”合一，且以“道”为主。他之所以强调这个“道”在文章中的决定性地位，就是要求“文”必须为时代服务，必须积极主动地适应和推动社会的发展。

文学性散文与历史和哲学著作的分离，对散文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这次分离，其意义也可以说是革命性的。正是由于这次分离，我国不仅产生了许许多多的散文名篇，而且也涌现出了像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散文大家，散文也才能够发展为相对于小说、诗歌、戏剧等而独立的文体，在中国散文宝库中，才有了大量气势磅礴的黄钟大吕式的历史篇章，有了诸多充满诗情画意的山水人情之作。然而，即使在这个阶段，散文的主流也没有离开时代一步。那些历史性篇章自不用说，即使柳宗元的山水小品、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周敦颐的《爱莲说》等也同样不是纯而又纯的文学作品，其中也深刻反映着社会。周敦颐的《爱莲说》不就是通过菊花、牡丹和莲这三种花的品评，慨叹真隐者少，有德者鲜，而爱富贵者独多么？结尾“牡丹之爱，宜乎众矣！”八个字，对世间争名夺利的人的厌恶，不明说而暗讽，愈显意味深长。散文与时代与政治的这种关系，实质上也是整个文学艺术与时代与政治的本质关系。即使很能叫座的历史剧，其中都能找出现实生活的影子，写古意在讽今。

散文的第三次飞跃肇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其标志就是，文体上开始了从文言文向白话文的转变，为更直

接反映人民革命斗争生活，为让散文真正走近人民大众，提供了所必须的文体条件；内容上开始由反映统治阶级之间的政治斗争或封建士大夫仕途坎坷、政治抱负的流露，转向对黑暗反动统治的无情揭露和深刻批判，用笔作武器，直接参加或反映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和建设生活；作者群开始由封建士大夫和文人骚客为主流，转向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先进知识分子为主流，并逐步形成以专业作家为代表、广大知识群众为基础的专业与业余相结合的新型创作队伍；其发展走向则第一次明确提出“文艺大众化”的主张，为散文发展的最后归宿——真正成为人民大众的散文指明了方向。

“五四”新文化运动，既是一次倡导并实践白话文的文体革命，也是一场以启蒙为中心内容的文化革命。虽然在此以前白话文已开始流传，但对文言文的统治地位以致命打击的正是这场文化运动和文学运动。1917年，胡适提出了他的“文学改良”“八事”，即“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烂调套词；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紧接着，陈独秀也发表了《文学革命论》，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伴随着这种文学主张的，是以《新青年》等先锋报刊为阵地的文学实践和文体实践。诗歌、小说、文明戏，特别是以小品文为主的散文，适应时代和社会要求，开一代风气。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吴虞……这些新文化运动中的风云人物，同

时也是白话文学和小品文写作的积极实践者。尤其是鲁迅，终其一生始终以杂文（小品文）为武器，“拒不超越”地挖掘、针砭着障碍民族进步的“国民性”和“奴性”，表达着对时代的切肤之痛，同时也为社会提供着良心的尺度。尽管“五四”以后的散文出现了分化，呈现着多样化发展的格局，也存在着无病呻吟的弊端，但就总的发展而言，仍然是健康的。然而，那个时期毕竟是一个政治上反动黑暗、经济上积贫积弱的时代，虽然也产生了像鲁迅、郭沫若等散文大家，也有诸多散文名篇，特别是鲁迅的后期杂文，甚至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高峰、世界革命文学中的奇葩，但在较清代“文字狱”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国民党反动文化围剿下，加上人民群众食不果腹的经济状况，这就决定了在那个时代不可能完成散文的第三次飞跃。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由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散文和其他文体一样，出现了大众化、通俗化和乐观化的趋势，并构成了现代文学史和现代散文史上的一道奇观。

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的散文作家满怀革命豪情，创作了不少反映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创造新生活、建设新生活的精神风貌和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散文作品，也涌现出了像魏巍、刘白羽、杨朔、秦牧、沈从文等散文作家，但散文的发展又因为长期实行计划经济所不可避免的“封闭”性社会环境的束缚，加上“左”的路线的干扰，而难以完成它的第三次飞跃。改革、开放带来了新的机遇，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和人文精神的复兴，20余年来，尤其80年代，出现了一大批受人欢迎的散文作品和作家，呈现着第三次飞跃的新的腾飞态势。但令人遗憾

的是，进入90年代以后，尤其是当前的散文创作，却出现了疲软的状态，与这个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时代之要求相去甚远。虽然也不断有一些好的散文面世，但那往往是才华的显露、缺乏的则是深刻与大气。

之所以说现在我们正面临着散文完成第三次飞跃的重大发展机遇，是因为我们面临的时代是被称为“第二次革命”的改革开放时代。正是改革开放，一方面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突飞猛进，另一方面又使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都在发生着革命性转折。如果说这个转折在其初期只需从路线、方针、政策方面进行拨乱反正就可以启动和实现的话，那么到了现在这个阶段所面临的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就决不是靠出台几项政策或采纳几项措施所能解决的，而是需要我们进一步用新的眼光、新的境界、新的方式引导人民去认识去解决。所以，这个时代，不论是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水平，还是政治上的开明，抑或是社会的需要，条件都比前两个发展阶段好得多。散文通过艺术的、潜移默化的方式去引导和推动人们顺利实现这种过渡，既责无旁贷、任重而道远，同时又是一个推动自身发展的难得机遇。在散文发展史上，散文前两次飞跃都带有革命性质，但我们面临的第三次飞跃，将是意义更为深远的的一个发展阶段。这次飞跃，那将是散文从文体到内容，从作者群到读者群都将发生重大变化的阶段，它将使散文完成向人民大众文学的转变，使这种文体在服务对象上实现质的飞跃。这就是我之所以说散文目前正在面临着第三次革命性飞跃的原因。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当前散文的创作现状却很不适应这个时代的要求。我们的散文作家在继承它的文学性上

是下了一番功夫的，而在写大事、大情、大理方面却显得缩手缩脚，好像散文与政治与时代没有缘分，二者是井水与河水的关系一样。这里面既有我们认识方面的误区，也有我们文风上的问题。这样下去，散文这个文学瑰宝，不但不能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服务，甚至还会失去让它走向社会，成为大众文学的大好发展机遇。那么，我们这些一直被誉为走在时代前面的文化人，就会在新的时代掉队，在中国历史上占有辉煌一页的散文就可能因为我们的迟钝懈怠而流入颓势。

是我们的时代不需要或不欢迎那些积极反映时代的散文作品么？答案十分明确：我们不但欢迎而且十分需要。像小说《人间正道》、《苍天在上》、《大厂》等；电视剧《英雄无悔》、《和平年代》、《红十字方队》、《情满珠江》、《大潮汐》、《外来妹》等等，它们之所以受欢迎，其实质，就在于他们及时地深刻地反映了我们这个火热的时代，用艺术的手段回答了人们在这个历史性转折时期的种种疑问，为人们当了这个转折时期的“先生”。就这个问题，如果在文学艺术这个“大家族”中进行一下分析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开放地区与内地、其他艺术形式与散文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反差。开放地区是以《红十字方队》、《英雄无悔》、《和平年代》、《情满珠江》、《大潮汐》、《外来妹》等深刻反映当前我们这个火热时代的作品为标志；而我们内陆地区所创作出来的则往往是那些历史性题材，或带有内地封闭落后特点的东西。在艺术形式上，我们的散文则与电视剧、小说等体裁相差了很大一段距离。电视剧、小说等体裁可以列出一大堆较为深刻地反映时代现实生活的名篇，而散文却很难找出几个这样的代表作来。一个随着社